

文章编号:2095-0365(2024)01-0059-07

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基于X市Q镇的分析

张宽, 毛春合

(青海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基层政府是主导乡村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主体。基于“强政府与强社会”的治理理念,以X市Q镇为调研案例,以“动员—服务—互信—共治”为研究思路,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表明,Q镇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面临着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偏差、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立足于简政放权、价值共识、民主协商、利益聚合等因素,提出相对应的基层政府行为优化路径,旨在提升基层政府治理效能,建构基层社会集体治理网络,促推基层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和互进互促。

关键词:基层政府行为;乡村治理;利益聚合;多元协同共治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24.01.0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梳理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乡村治理战略所要实现的是基层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是群众民主权利充分保障、建设热情充分迸发、乡村社会活力充分涌现的系统化治理。近年来,Q镇政府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乡村治理的整体要求,结合本地实情主导展开了探索实践。在基层政府的有力主导下,Q镇乡村治理工作稳步进行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经验。但是,Q镇政府在推进治理进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提升其治理行为能力,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是当下需要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

议题。

当前学术界关于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行为研究已成为一种热点主题并产出了基于不同分析视角的研究成果。一是关于基层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中的行为策略探讨。基层政府作为主导基层治理的责任主体往往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基层政府需要灵活地采取治理行为策略^[1]。基层治理中政府的常见行为方式主要有:协调行为、整合行为和资源配置行为等^[2],政府需要与其他主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实现治理公共性^[3]。同时,治理环境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也要求基层政府发挥治理主体作用,创新实践举措,全面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4]。二是对基层政府的行为偏差和困境分析。从政府主体分析,基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往往出

收稿日期:2023-05-25

基金项目: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青海省县域城镇化与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关系及耦合机制研究”(22ZCY046);青海民族大学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专项课题“共同富裕视域下青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ESDYJ09);青海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39M2023010)

作者简介:张宽(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本文信息:张宽,毛春合.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基于X市Q镇的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1):59-65.

现公共政策实施偏好、利益驱动问题^[5],少数干部为了完成上级部门的任务会采取“策略主义”进行应付^[6]。一些地区政府和创新治理实践中出现了追求名词标新忽视实质行动、追求经验移植忽视回应需求、追求局部亮点忽视科学统筹和追求政绩邀功忽视持续发展的“伪创新”现象^[7]。在治理情境中,基层政府还经常面临着目标偏离的治理之困,表现为:基层资源配置的政治考量、角色错位的互动行为、上下离散的执行行为等等^[8]。三是关于基层政府治理行为的优化路径研究。为了有效应对基层治理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发挥好基层政府的治理主导作用,首先应该重构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理顺政社关系,促进党政治理结构整合,协同其他治理主体,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9]。其次,深入推进基层民主进程,重塑地方政府偏好^[10],完善基层民主自治的法制性要素^[11],做好资源整合、组织创新、社会培育等工作,平衡社会发展效率与公平,寻求有限政府和无限政府之间的动态平衡^[12]以保持社会治理的活力与动力。

二、案例选择:X市Q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行为

Q镇位于河北省西部地区,总面积大约6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万多人,辖25个行政村。Q镇经济发展良好,尤以塑料加工产业为主,近年来,Q镇陆续建成了机械制造、水果加工、化学纤维、雕刻工艺等产业,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随着经济不断发展,Q镇乡村地区也发生了全新变化,治理环境也更加复杂。Q镇政府奉行“多元参与、共同治理”原则,积极履行政府职能,联合各主体和民众群体共同治理、共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

(一)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

为了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Q镇政府创新实施网格化治理方案,如调派部门干部到M村指导开展网格化治理工作,将M村划分为9个网格片区,由村干部担任片区网格长,选举村民代表担任网格员,共同开展政策宣传、民意收集、事务处理等工作,M村取得了民众群体在各网格区域内共建共治的良好成效。T村两委联合驻村干部,通过工时结薪、生活补贴、模范评选等措施积极引导民众参与乡村道路维护、村民休闲场所建

设和生态环境治理等工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密切了党群关系,提升了民众对村两委及乡镇干部的认可度和满意度。充分发挥党员群体的工作积极性,分批次抽调党员联络各类社会团体及企业,开展对点帮扶工作并鼓励这些主体参与乡村发展和建设事业。Q镇塑料加工产业发展良好,一直是县级支柱产业,但因空气污染问题陷入发展困境。镇政府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协调对接县政府、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采取低息贷款、降低税收等措施帮助相关企业引进环保生产设施,重新激发了地区经济活力。

(二)持续规范基层公共服务

面对乡村社会全新的治理形势,Q镇加快建设服务型 and 智能型政府,不断促进公共服务质量升级。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方面,镇政府明确公共服务范围,制定系统化的政务处理措施,严格规范各部门和村两委按规章制度办事。组织党员干部进行基层调研,将民众关心的热点和重要问题及事件列入重点工作范围并优先处理。实行公共服务动态管理,确保基层政府“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服务到位,这些措施实现了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和政府形象的正向建设。针对民众需求多样化的问题,镇政府努力实现基层服务方式创新,实施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日常事务处理,切实提升了服务效率。同时,镇政府不定期选派干部到乡村进行现场办公并随机选取民众进行服务评价和询问,有效保障了公共服务质量。Q镇智能型政府建设工作也取得了一定实效。镇政府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并配备部门客服人员,民众可在线上反应问题及诉求,日常的大部分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开辟官网服务专栏,实施事务规模化办理方案并推广链条式和一站式服务。打通“58同镇”“Q镇在线”网络渠道,接收民众提出的各种合理意见并进行工作调整。创新实施告知承诺制,将重大事项的决策结果和流程进行网络专栏公开以告知广大民众,将承诺办理的事务妥善处理,给民众和各类组织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服务,为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增添了动能。

(三)提升多元主体信任水平

镇政府探索推行“纵向共建、横向联动”的治理措施以提升多元主体间的信任程度。鼓励并支持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承担部分社会公共服务。

如:W村大量年轻人口外出务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年人赡养缺失问题,镇政府实施资金补贴、设备支持等措施,引入民营企业在W村建立了养老院,有效缓解了老年人赡养困难问题,也深化了基层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互动合作。同时,镇政府联合农业合作社、乡村民众在果树病虫害防治、桃花节旅游开发、文化休闲广场建设等事务方面共同发力,切实激发了一些群体的参与和建设热情,促进了各主体通力合作与互信互促,在一些乡村事业建设领域实现了共建共治的成效。

横向联动层面,镇政府重视各类主体的功能优势,实施民主协商和多向协调办法,鼓励其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制定实施主体代表联席会议制度,每当召开关乎乡村发展的重大会议时,则召集企业家代表、社会组织负责人、村干部、村民代表和部分村民共同协商议定,以保证事项议定和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会议结束后将各项决策进行公示,及时接收合理的建议与意见。创新多元联动思路,定期组织党员干部、企业人员、社会团体成员等联合开展志愿服务乡村活动,引导相关人员深入乡村一线了解民情、服务民众,在多种实践活动中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增进基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乡村民众的感情。

(四)协调多元主体共建共治

为了促进各主体共同落实治理责任,Q镇政府建立了“资源支持、服务反哺”机制。镇政府在资金、政策、技术等资源层面多方协调,助力本地区企业和一些社会团体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企业和社会团体在享受镇政府资源扶持的基础上要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农业发展等领域进行一定的投入和帮扶,和政府人员共同开展乡村治理和建设。如A塑料加工公司在近几年的发展运行中享受到低息贷款、税收优惠、设备改造等多项扶持,企业效益持续向好增收。A公司为了回馈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于当地乡村新能源路灯替换和小学校园建设等事务方面进行资金支持和人力投入,企业也受到了镇党政机关、村两委和民众的一致好评。

贯彻实施互利共赢的合作方案,走上基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之路。L园林绿化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承担起13个乡村的道路绿化工程,经过多年的投入与改造,各乡村的生态环境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以前我村不注

重道路沿途植物和树木的保护和管理,再加上车辆碾压、人为踩踏等问题,村里的植物存活率较低,但也没多少人关注这个问题。近年来,县、镇政府和生态环保部门对于农村生态自然环境保护和治理愈发重视,经常派遣干部下乡村来检查环境问题。经过L公司人员的技术性改造和日常修剪保护,村委会也加强了植被保护力度,同时还经常组织村民种树种草,这几年道路沿途的植物越来越多,乡村环境也越来越好”。通过开展乡村道路绿化工作,镇党政机关、企业和乡村民众均积极参与,实现了多方协同治理自然环境的良好成效。

三、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内在逻辑

随着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我国逐渐在治理实践中获得治理自觉,寻求符合中国实情的治理之道^[1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基层政府作为党和国家政策决议的执行者,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14]。

(一)构建乡村社会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中推动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各方各界的共识,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逻辑,侧重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和资源整合^[15],是保持治理创新活力的有效方法。多元主体掌握着不同的资源,具备各自的经验优势,但个体独立发展往往会陷入困境,甚至走向消亡。因此,多元共同发展成为主流趋势和观念取向。具体而言,协同治理不仅仅是集聚主体资源和技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主体意识的改造与升华,达成的效果体现为主体间互信互助并确立坚持党组织和政府领导的统一性观念。在集聚力和观念统一的基础上,多元主体再展开治理实践。在治理活动中,党组织全面科学引领,政府合理调配各类资源、注重平衡主体利益、正确分配发展成果,各主体积极参与、奉献并协同配合,盘活闲置化资源,整合经济、

文化、人力等要素,最终实现乡村善治和主体共同发展,这便是多元协同治理的价值旨归。因此,基层政府作为关键角色,必须全面联合其他主体,主导构建起乡村治理共同体,焕发乡村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

(二)促进乡村社会全面振兴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之后,在党的领导与政府的主导下,我国统筹乡村地区“五位一体”发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坚持系统化治理,乡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提高。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好生活成为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与此同时,乡村人口结构、民众素质、价值观念等都出现了全新变化,社会矛盾也日益呈现多元多样、多变多发态势。我国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对照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乡村振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宏伟目标,全国农村地区仍有一些生活困难人口,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人群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较大,民众在居住、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巨大障碍。为了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就要展开治理实践,而基层政府的性质决定其应主动承担起主导治理的职责,全方位发挥政府职能,建设物质精神并行、治理井然有序和自由公正法治的现代乡村社会,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困境分析

(一)动员:多元主体存在认知和行为差异

治理意味着公共机构和社会行为者共同参与^[16]。西方国家的治理变革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并满足公民的社会需要^[17],治理改革最终实现了市场的扩大化,政府完成了更小而有效的职能转变,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治理实践遵循“政党—政府—社会”^[18]的三维框架,但西方社会的多元参与模式对于我国乡村治理仍具有正向的借鉴作用。长

期以来,Q镇各乡村都是在村委会主导下进行管理和建设,甚至充斥着一定程度的行政味道,各类主体对治理的认知呈现出局限化、模糊性和差异性的现象。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活动的作用,^[19]伴随着意识层面的认知局限和差异,多元主体和乡村民众的治理参与行为也发生偏差,表现为部分主体参与治理的意愿较为高涨,而其他主体则表现出冷漠态度,其参与行为对应地呈现出差异现象,这也造成乡村社会内生动力被削弱,无法完全聚合多元主体的资源与能力。

(二)服务:政府回应与治理诉求有所失调

现实情景中,Q镇政府主导推进乡村治理实践,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服务质量也在逐步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多元协同共治需要政府在实现整体利益聚合、统一价值认同、治理合力集聚等方面付诸实践,促使多主体互动从短期平衡走向长期平衡^[20]。没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及协同配合,治理的终极价值便无法实现,但Q镇政府在现阶段还无法做好这些工作。此外,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广大民众的需求逐渐转变为多元化的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社会需求等^[21],基层政府如何提供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已成为现实诉求。近年来,Q镇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其生活追求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改变。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如:医疗服务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生态环境宜居等均已非常普遍。面对多元化的大众需求,Q镇政府还无法提供等效的公共服务。

(三)互信:治理主体的信任水平相对较低

在传统乡村内部,民众之间形成了相当高度的信任水平,其整体的身份认同和关系纽带发挥了观念规范和情感聚合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全面转型,基层社会也发生了全新变化。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为了让基层群众享受到现代化成果^[22]。乡村转型催生了不同身份主体的出现,而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时代变革呼唤多元主体的共鸣,因此,全面转型阶段社会主体间的信任水平再度引起了社会各方的普遍关注。Q镇政府不断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各项工

作,在W、X等几个乡村的事务建设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受制于追逐利益的自发性、企业之间的竞争性、特定事务的排他性等问题,Q镇多元主体间的整体信任水平相对较低,主体互动和集体行动进展不畅,造成了治理力量的分离、治理资源的闲置、共同理念的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四)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离散现象明显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曾提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23]。在治理过程中基层党政机关要与社会团体保持密切互动与合作,共同协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调研发现,Q镇多元主体缺乏互动与合作,镇政府的协调效果也不够明显,多元主体离散化现象较为明显。虽然镇政府在部分企业扶持与乡村工程建设等领域与其他组织有相关合作,但这也只是少量现象。另外,乡村治理价值理念共识的建构需要经过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协商与共同界定。集聚多元主体形成集体治理结构只是前提和基础,如何充分激发多元主体的智力和行动进而形成组织优势,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协同合作、集体行动、共建共治方能最大程度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然而,以上问题都是Q镇乡村治理工作当下存在的,其根源便在于多元主体的离散和“原子化”参与缺位,这也严重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成效。

五、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善治”的实践进路

(一)内驱外引提升基层政府的动员效能

框架结构理论强调通过集体动员以及制造意义从而获得集体行动价值^[24],因此,Q镇政府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激发多元参与活力。情感联结是社会治理过程中常用的动员方式,其根植于传统基层社会对人情关系与伦理道德的重视与运用。乡村社会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并不是伴随着社会自组织的建立而直接产生,集体情感的聚积与传播以及为各主体认可的共享情感对集体行动的触发与拓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25],情感动员便成为连接多元主体结构和共同行动的纽带。基层政府动员各主体和民众参与公共治理事

务,要紧紧依靠基于人情关系的互动网络、基于群体利益的关系纽带等无形资源,从而填补技术性治理的空缺,将居民吸纳进入各类事务之中。实行宣传动员策略,创新宣传形式。通过责任宣传,促使各主体树立起治理职责意识并规范其实践行为。通过主体功能宣传,强化多元主体的价值优势认同,激发其参与积极性。通过治理目标宣传,明晰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并调动各类群体的治理动力。

(二)创新拓展基层政府的服务格局

乡村社会形态的转变对基层政府的治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Q镇政府主导乡村治理,需在引导社会观念、协调多元利益、引领乡村建设和生态治理等领域发挥主体功能,创新拓展服务格局。促进乡村社会价值引导,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进行民众群体价值观的培育,以塑造治理有序的社会氛围。促进多元协同最关键的环节便是利益协调问题,基层政府可采取“整体利益+个体利益”结合的调配办法,在治理过程中全面保障个体利益发展,在关乎全局利益的事务方面使个体利益服务于整体利益,在个体利益冲突时以共同利益进行协调。统筹乡村社会“五位一体”建设,既夯实乡村社会的物质文明基础,提升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又不断创新乡村精神文明样貌,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乡村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性关联物权^[25],将各主体和民众内在地串联在一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和维护就是在保护集体物权财产,建设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必然涉及多方参与,从而能够培育各主体的共同体意识。

(三)持续提升多元主体间的信任存量

面对治理实际,在政府治理创新中融入社会合作理念是大势所趋^[26]。当下的乡村社会转型在生活共同体基础上过渡为治理共同体,伴随着公民社会力量的不断增长,多元主体的信任水平决定了主体间的协同程度。Q镇政府应推进政治信任存量和社会信任水平同步增长。通过策略性沟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及日常中的帮助和关爱等措施以实现基层政府、多元主体及民众的高度情感联结,塑造成相互依赖、互动互助的情感共同体。同时,基层政府要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向多元主体提供全面的服务和帮助,借助传统的“讲人情”“顾面子”等习俗完成主体关系的循环对接,进而在各类人群

“报答人情”基础上促进主体关系互动和情感深化,最终实现“民众感激、拥护和依赖基层政府”的效果,这也就促进了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培育诚信理念与契约精神相融合的治理诚信文化,注重传统仁义礼智信思想的运用,提倡多元互进互促的价值理念,进而完成主体的意识塑造和行为规范。另外,鉴于Q镇多元主体离散化的现象,政府还应掌握各主体的日常需求和问题困难,建立健全多元协商机制,共同处理各类事务和问题,全面提升多元主体间的社会信任水平。

(四) 构建“政—社”互嵌的协同治理结构

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现协同共治^[16]。基层政府应联合各主体和民众建构起协同共治理念,实现价值认同。制定主体责任边界,发挥德治、法治和智治等要素的功能,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原则,寻求多元共治之道。这种“共治之道”应基于乡村现代化建设实践,符合普适性治理规律和发展方向,遵循问题导向,具有应用性^[27]。同时,在制定主体责任边界过程中还应当明晰多元主体在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价值功能,实现治理网络的纵横互构,充分发挥主体资源优势,以共同绘制治理集体行动网络^[28],塑造乡村社会多元治理共同体并持续提升协同治理成效。

六、结论与展望

乡村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实

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既需要基层政府发挥主体作用,又需要多元主体的殊力建设。当前,浙江省枫桥镇、广东省横沥镇、上海市朱泾镇等一批治理成效显著的典型地区均探索出了适合本地实情的治理之道。Q镇政府也围绕区域特色,在借鉴参考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治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虽然现阶段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但伴随着党组织的全面引领、基层政府的及时调整与民众意识的全面更新,相信Q镇乡村治理工作会更加协调有序地深入推进。

乡村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和交汇的基层地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底部场域。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在本质上的一致性直接保障了政府与人民群众合作的价值基础,而乡村治理便是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平衡、协调、发展、深化的直接实践。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治理,首先要实现主体逻辑由“管理社会”向“引导社会”的成功转变,并依据治理实情,将政府功能转变、优化与发挥贯穿治理全过程,时刻保持现代化的治理思想和高标准的治理行为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乡村治理重在实现多元共建共治共享,这就必然要求多元主体全面参与、建设与奉献。推动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基层政府在过程中既要平衡好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更要处理好民众群体的内部关系,统筹推进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团结带领多元主体共同创造乡村社会文明新业态。

参考文献:

- [1] 余成龙,陈尧. 把时间带回治理:基层政府行为中的效率——基于赣西W镇政府“海绵城市”项目建设的追踪观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22(1): 95-106.
- [2] 曾莉,李佳.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基层政府行为:行政主导抑或合作共治——来自上海市P社区的田野调查[J]. 学习论坛, 2020(7): 82-88.
- [3] 李慧凤. 公共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管理行为优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2): 22-30.
- [4] 何得桂,武雪雁.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 33-42.
- [5] 卢江阳,吴湘玲.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J]. 中州学刊, 2023(2): 19-23.
- [6] 陈天祥. 基层治理中的策略主义及其纠治[J]. 人民论坛, 2023(3): 48-51.
- [7] 姜晓萍,吴宝家. 警惕伪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偏差行为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10): 41-48.
- [8] 李建勇,张建英.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3): 323-330.
- [9] 田先红. 项目化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县域政府行为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22(3): 136-147.
- [10] 李齐,李欢欢.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J]. 理论探讨, 2017(6): 19-26.
- [11] 张新文,郝永强. 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治理行为

- 问题研究[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85-94.
- [12] 张高军, 易小力. 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 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5): 32-52.
- [13] 徐勇. 在治理创新实践中寻求“治道”[J]. 行政论坛, 2022(2): 5-9.
- [14] 张新文, 郝永强.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12): 68-77.
- [15] 李汉卿. 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 理论月刊, 2014(1): 138-142.
- [16] 俞可平. 治理与善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3.
- [17]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2.
- [18]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 探索与争鸣, 2019(8): 85-100.
- [19] 刘建军, 郝立新, 寇清杰, 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6.
- [20] 李斌, 李晶晶. 村两委“一肩挑”全面推行中多主体互动机制及其完善路径[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17(2): 35-41.
- [21] 郁建兴, 任杰.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J]. 政治学研究, 2020(1): 45-56.
- [22] 胡华豪. 标准化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价值、限度与策略[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5(4): 49-53.
- [23] 俞可平. 全球化: 全球治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
- [24] 刘杰. 框架构建、身份认同与激情政治: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文化范式[J]. 江海学刊, 2017(5): 91-97.
- [25] 赵欣. 社区动员何以可能——结构-行动视角下社区动员理论谱系和影响因素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11.
- [26] 陈晓. 社会合作: 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新视角[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15(3): 57-62.
- [27] 文宏, 林仁镇. 多元如何共治: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J]. 理论探讨, 2022(1): 62-69.

The Inner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Good Governance”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 Town of X City

ZHANG Kuan, MAO Chun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is the key body leading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concept of “strong government and strong Duhui”, this study takes Q Town of X City as the research case, and takes “mobilization-service-mutual trust-co-governance” as the research idea,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behavior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in rural governance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of Q Town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deviations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imbalance between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governance demands, and the relatively low trust level of governance subjects. Combined with the factors such as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 value consensus,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interest aggreg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optimal path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behavior is propos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nstruct the collective governance network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nd mutual advancemen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social subjects.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ment behavior; rural governance; interest aggregation; multiple coordination and co-governance